

2009 臺灣近現代政治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陳翠蓮*

摘要

本文回顧 2009 年臺灣近現代政治史研究成果，將近百筆的研究成果分為日治時期、戰後時期及共同課題三部分，再就各時期之主要研究課題與成果加以討論。研究發現，2009 年臺灣近現代政治史的研究主題大多是舊課題的延續，殊少新課題的開發。其次，臺灣史學者呈現「理論焦慮症」，但不當的理論運用，效果適得其反。2009 年的好作品，多是建立在重要的提問與紮實的史料、考證基礎之上。再者，部分作品明顯不符學術規範，臺灣史學界應建立嚴格的評審機制，避免學術研究成為政治立場論述，影響臺灣史研究的信譽。並且，2009 年也出現許多 1949 外省人來臺的「流亡書寫」、蔣介石研究，但此些被定位為中華民國史的課題與觀點，與臺灣史研究幾乎成為兩條平行線；如何使臺灣史與中華民國史相互對話、甚至形成共識，是未來應該努力的方向。

*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一、前言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文獻類目》中所收集之 2009 年臺灣政治史成果 141 筆，較之 2008 年的 182 筆，減少近四分之一，減幅明顯。又由於今年《文獻類目》所收集之研究成果擴及日文、韓文與英文作品，扣除這些，臺灣學界之研究筆數更少。政治史研究成果日漸減少，這是延續多年來的趨勢，下滑幅度之大，令人怵目驚心。

在這 141 筆研究成果中，通論性 19 筆比前一年的 15 筆稍有增長外，早期、清代、日治、戰後的研究成果都呈減少情況。其中日治 46 筆、戰後 62 筆，佔政治史總成果的七成六，近現代研究成爲政治史研究的主流，也是近十年來的明顯趨勢。以下本文將以近現代政治史爲焦點，整理出 2009 年研究成果之主要討論課題，並就其史料、方法與觀點加以討論。

其次，2009 年正逢 1949 國府遷臺六十週年，學界成果與坊間出版品不少；2009 年部分研討會論文集如蔣渭水研討會、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研討會未納入《文獻類目》之中，在此一併納入討論範圍。

二、臺灣政治史的主要研究趨勢

(一)日治時期政治史研究成果

日治時期政治史研究共 46 筆，比 2008 年的 60 筆略減，其中學位論文佔 9 筆，也比 2008 年的 12 筆略減。

1、法律史研究

臺灣法律史研究在臺灣史研究中自成一支，以王泰升教授爲首的團隊多年來查察、發掘、整編檔案，並與臺大圖書館合作進行數位化工作，陸續呈現其努力的成果。2008 年 9 月「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正式啓用，2009 年 3 月則舉辦了「日治法院檔案與跨界的法律史研究國際研討會」，並出版《跨界的日治法院檔案研究》一書。該書爲研討會論文成果，由王泰升說明日治法院檔案之發掘、整編經過，並指出未來之研究應用方向與課題、史料局限與克服方法等，項潔報告日治法院檔案數位典藏系統的研發與建置；其次有新田一郎介紹東京大學明治文庫所藏宮武外骨收集之裁判相關資料，淺古弘介紹並比較日本所藏與臺灣所藏日治法院檔案；Susan L. Burns 探討明治時親權問題，Kelly B. Olds 探討殖民時期臺灣女性的土地所有權問題。全書以日治法院檔案及日本現存檔案介紹爲主，該資料庫的建置完成、開放應

用，可說是臺灣法律史研究的重要基礎。2009 年的研究成果中，臺大法律所王祥豪的碩士論文〈日治後期國家法對政治異議者的處置〉，即是利用日治時期法院檔案與臺灣菁英的日記，討論現代法治規範如何被引進臺灣統治與臺灣人如何透過現代法治知識對抗國家統治。文中對於治安警察法、治安維持法等中要法規的引進背景有所說明，並就法院檔案說明統治者對左右翼運動寬嚴不一的處置態度、存在於統治者之間如總督府、檢察官、司法官不同的法律見解，及被治者與統治者的法理攻防有所闡釋。無論在史料運用、研究課題開發與研究發現，均有可取之處，是相當出色的學位論文。

另外，山室信一的〈國民帝國的異法域統合與差別〉探討日本帝國及臺灣、朝鮮、樺太、關東州等殖民地之間異法域與不同法律體系適用的情形，指出各殖民地的法律規範並非任意交錯摻雜，帝國結構下所刻意建構出來的法體系與規範的權利與義務，是以保障母國人民居於最優越地位為目標。日本帝國雖然希望達到全國統一法域的理想，但直到帝國崩潰時仍無法擺脫異法域的結構，此中的矛盾在於，一旦達成人人平等的國家，意味著「帝國的死滅」。王泰升的〈日治時期臺灣人法意識的轉型：臺灣法與日本法的相互融合〉，則觀察臺灣漢人與原住民在經過日本統治經驗後，在法律意識方面的變化。研究發現臺灣漢人的近代立憲主義觀、訴訟觀、民事正義觀都受到由日本法移入的歐陸觀點的影響，發生法意識的轉型，唯獨原住民仍被排除在外。山室信一所做帝國間不同法域法規的比較，王泰升所做臺灣不同族群法意識轉型的比較，屬於不同層次的宏觀研究，並提綱挈領指出方向，值得進一步深入發展。

2、國族主義與政治認同

國族主義與政治認同課題，向來是日治政治史主要討論的重點，過去也累積了許多重要研究成果。2009 年的研究成果中，此課題仍然受到關注。陳佳宏的〈日治中期至二二八事件前後臺灣之認同糾葛：以菁英為主的分析〉一文，討論 1920-1950 臺灣人在國族認同上的變化，全文涵蓋時間甚長、觸及的史實與主題甚多，在國族認同之定義不明、錯誤史料缺乏考證、對史料去脈絡化的任意使用等問題，遂使全文呈現出結構鬆散、論證主觀的情況。陳佳宏的〈殖民、再殖民到解殖民？：林獻堂晚年的政治意向〉，探討 1936-1956 林獻堂的政治認同、行動與選擇，也有類似的問題。此文所討論的時間橫跨二十年，但作者缺少時局變動的觀念，也缺乏對複雜情勢的體會，以疏離的、事不關己的、平面的方式進行討論，於是林獻堂被評價為懦弱、鄉愿、馴化、見風轉舵、言不由衷、仰人鼻息等形象。其次，由於橫跨時間甚長、牽涉課題甚多，諸多關鍵問題被含糊帶過，例如東亞共榮協會、八一五獨立事件、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光復致敬團等等，作者都在未究明史實的情況下想當然爾的進行評論。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何義麟的〈1930 年代臺灣人的國族認同：以臺中「東亞共榮協會」之發展為中心〉一文，以充份的史料梳理東亞共榮協會成立始末、官方的意圖、臺日雙方主要幹部對「內臺融合」的不同想像、軍部干涉下

該協會被迫解散等等，相當立體的呈現出在臺日人的內部矛盾、臺灣人菁英的認同困擾與生存策略、時局變動與各種政治勢力的交手與角力過程，精確而精緻的討論方式，使得全文焦點集中、證據充分，論證具有說服力。

中山大學亞太區域所李歷芬的碩士論文〈日本殖民時期臺灣的民族主義之研究(1895-1945)〉，也犯了大而無當的毛病，不僅時間跨度五十年，將族群、日本侵臺、國際因素等、臺灣民主國以迄於臺灣農民組合、臺灣共產黨等組織與運動都納入討論範圍。又全文並非一手史料為基礎，而是將不同觀點、甚至看法對立的研究成果貫穿為民族主義形成期(1895-1919)、民族主義轉變期(1919-1936)、民族主義沉睡期(1937-1945)，更是大有問題。臺灣師範大學政治所井上一宏的碩士論文〈日治時期臺灣人民國家認同之探討：以公學校修身教育為主〉，主要在討論修身課程對於臺灣人國家認同之影響。教育史有關修身課程之研究成果相當豐碩，井上的討論並未超出前人，但他別出心裁之處在對五位受過日本教育的臺灣老者進行口述訪問，驗證修身教育的影響，用心之處值得肯定。

日治時期國族認同研究已有二、三十年的成果累積，不僅數量可觀、研究深入，不同觀點者也有許多論辯交鋒。從以上的成果回顧可以看到，新進的研究如果仍然停留在舊問題意識上進行泛泛之論，已屬落伍。如何提出新問題，或針對具體事件或個案進行精確解析，或在史料上加以開拓，是更值得努力的方向。

3、日治政治史其他課題

許介鱗所著《福澤諭吉：對朝鮮、臺灣的謀略》，如同 2008 年的《後藤新平：一個殖民地統治者的紀錄》小冊，延續他長期以來的反日、抗日史觀，欲拆穿福澤諭吉「文明開化啓蒙思想家」與後藤新平「臺灣現代化奠基者」的評價，揭發兩人為日本帝國利益無所不用其極的謀略，特色甚為鮮明。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劉碧蓉的博士論文〈日本殖民體制下星製藥會社的政商關係〉可說是許介鱗觀點的延伸，探討星一與星製藥與後藤新平的政商關係與事業發展。日治時的政商關係研究，除了鍾淑敏、¹ 朱德蘭² 等人的成果外，尚不多見，是相當值得開發的研究課題，本文的嘗試值得鼓勵。但是，本研究成果仍有諸多待商榷之處：例如，從文中可知，星一所主持的星製藥會社政商關係多元而綿密，並非作者所信只建立在與後藤新平的關係上；「臺灣阿片事件」究竟涉及怎樣的政商關係，未能清楚說明；又，受限於星藥科大學的史料，全文與其說在拆解星製藥的政商關係黑幕，反而更像是星製藥會社的發展史，為該會社的屢仆屢起、經營理念下註腳。

王學新的《日本對華南進政策與臺灣黑幫籍民之研究(1895-1945)》與《日治時期臺灣保甲制度之研究》兩書，前者探討日本南進政策中的謀略，尤其是關於臺籍浪人的運用及鴉片謀略運用，後者探討日治時期的保甲制度。有關臺灣籍民浪人、

¹ 鍾淑敏，〈政商與日治時期東臺灣的開發：以賀田金三郎為中心的考察〉，《臺灣史研究》11：1，2004.12，頁 79-114。

² 朱德蘭，〈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的政商網絡關係 1936-1945〉，《臺灣史研究》12：1，2005.12，頁 75-119。

鴉片走私、保甲制度都不是新課題，王學新的優勢是利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前書日本外交史料館、亞細亞歷史資料中心檔案等，進行有系統的鋪陳討論。但，王學新企圖利用社會學「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與「鑲嵌」(embeddedness)的概念說明臺灣籍民浪人如何發展，結論卻是「即使不與主流社會鑲嵌，只要能與權力當局掛鉤，照樣能呼風喚雨甚至導致社會混亂失序」，相當突兀。又，在保甲制度研究中，王學新將 1920 年代臺灣抵抗運動由右轉左視為認同轉變(identity shift)；以涂爾幹的《自殺論》來說明統治要長治久安必須加強人民集體紐帶；用「新制度主義經濟學」(neo-institutionalism)的相關概念解釋保甲制度的成敗等等，也不盡妥適。歷史研究者對社會學理論理解與掌握有限，率爾運用，自由聯想，存在不少疑問。

有關日治時期警察的研究，也不是新課題。有別於以往所關心警察制度的建立、警察統治的運作等等，臺灣大學歷史所李幸真的碩士論文〈日治初期臺灣警政的創建與警察的召訓(1898-1906)〉將研究焦點放在為什麼殖民地臺灣警察以日本人為主？日本人警察需具備那些技能與知識、尤其是臺灣語能力如何獲得？臺灣人警察在何種背景下被納入？哪些臺灣人會去擔任殖民地警察？又會衍生哪些問題？在這些不同以往的問題意識下，李幸真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鷺巢敦哉作品、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沿革誌等一手史料，重建警察訓練實況、勾勒臺灣人巡查補的選擇與處境，是篇平實卻相當生動的作品。

(二)戰後臺灣政治史研究成果

1、二二八研究

首先，二二八研究仍是 2009 年戰後史的重點。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所舉辦的二二八事件 61 週年與 62 週年學術研討會，都在 2009 年出版論文集。61 週年的研討會論文集共有 23 篇論文，分為戰後臺灣處境、亞洲人權案例、外國人眼中的二二八、法律與轉型正義、大國與小國關係、二二八事件懸而未決的問題等幾個單元。其中與史學相關的論文包括，林元輝比較二二八事件期間臺灣官方與民營報紙對事件起因之報導；涂醒哲討論戰後初期臺灣與中國公共衛生水準的落差；陳慈玉探討臺灣碱業、鋁業與煤業等工礦產業發展在戰爭末期與戰後初期的連續與斷裂；何義麟分析二二八事件前臺灣人自治論爭、此論爭與左翼的關連及國府為何以「奸黨操控」看待臺灣社會的自治要求；蘇瑤崇以葛超智資料與外國報紙呈現外國人眼中的二二八事件；王景弘以《紐約時報》為焦點說明二二八事件新聞並未受到美國媒體的關注；黃秀政與蕭明治探討延平學院的善後賠償問題；陳儀深釐清所謂「綏靖」與「清鄉」的分工與意涵，並認為實際上是黨國意識形態之下的「秋後算賬」；又吉盛清檢討了二二八事件中沖繩人的受害情形與原因，並提示殖民統治關係中沖繩人同時身為受害者與加害者的身份；謝聰敏則以劉明在白色恐怖時期的受害與財產被侵吞問題，說明轉型正義應面對與處理的課題。

二二八基金會自 2004 年結束補償業務後，著重於真相探索與教育文化推廣，2006 年以後更致力於轉型正義的工作，除了籌辦人權與轉型正義為主題的研討會，也重視國際經驗的交流。上述研討會正是在此背景下的成果展現，所發表的論文未必以嚴謹的學術討論為目標，反而更重視問題的提出，而部分論文確實對當前研究產生重要的提示作用。例如，林元輝的研究直指臺灣新聞媒體、新聞教育缺乏歷史意識，只看到表相，不去探究事情的本質、脈絡與前因後果，並具體處理二二八事件當初官方與民間媒體報導的差別，呈現日後壓制輿論的原型。蘇瑤崇近年來持續關注二二八事件史料的開拓，其論文介紹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保存的葛超智資料，及臺北市二二八紀念館葛超智檔案中的應文剪報資料，比對外國人眼中的二二八與陳儀當局的媒體操作，努力開闢二二八研究的新課題，值得肯定。尤其該論文的四個附錄整理胡佛研究所資料、臺北市二二八紀念館英文剪報、《The China Weekly Review》二二八事件報導、官方出版品，足以提供研究者按圖索驥。政治受難者謝聰敏博聞強記，他的論文研究劉明，不只使用到檔案、史料、研究成果、回憶錄等，更引用了諸多他與劉明、陳逸松等事件當事人的一手訪問，本文不只是一篇研究，文章本身就是可貴的史料，而他所關注的情治人員、黨國大老掠奪政治犯財產的現象，更是提示了白色恐怖研究的重要課題。雖然在文章中，謝聰敏將軍統人員、後來遞補為立委的「劉秋芳」誤為「劉秀芳」，整體而言是瑕不掩瑜，貢獻良多。

二二八基金會主辦的事件 62 週年學術研討會以「歷史教育與承傳」為主題，論文集集中分為媒體觀點、文化藝術、事件研究、轉型正義等主題，共收錄 12 篇論文，與歷史研究相關的有吳嘉純的〈從《人民導報》看戰後初期臺灣的文化適應與社會衝突〉、石育民的〈廣播與收音機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張耀仁的〈二二八事件期間駐臺中國記者報導之析論：以報導事件起因、省籍形象與引述消息來源為例〉、翁嘉禧的〈二二八事件時期臺灣經濟危機之探討〉、倪仲俊與李汾陽的〈二二八事件前本土菁英的參與障礙與其我群意識之形成〉等等。這些論文以年輕研究者與博碩士生為主，大致而言，在檔案史料、研究課題、方法或觀點上並未有明顯的開拓與突破。

其中，較為突出的論文有三：顧敏耀的〈臺灣古典詩與二二八研究：以林獻堂、曾今可及其步韻詩為主要研究對象〉、鄭志敏的〈從「市參議員」到「淒慘議元」--論二二八事件前後的第一屆高雄市參員〉，及劉熙明的〈再論蔣介石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責任：由蔣介石在國共內戰的作為來分析〉。顧敏耀從《正氣月刊》中挖掘出百餘首尚未被討論過的關於二二八事件的詩作，並分析發現，無論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古典詩人的作品大多數是對官方立場學舌與附和，將事件領導者如謝雪紅、王添灯醜化、將處委會汙名化；族群身份有影響書寫角度，如曾今可等外省人的詩作充滿殺伐之氣與對臺灣人民的偏見，但少數本省人林獻堂、葉榮鐘、周定山、曾紀焜等則較能站在臺灣人民的立場表示哀悼與批判。此文不但在史料上有所突破，其分析也相當深入而有見地，尤其所討論「正氣學社」與曾今可、軍方的關係，曾今可在戰後初期臺灣文壇或文化界的角色，更值得繼續追索。鄭志敏研究戰後初期第一

屆高雄市參議員，以官方史料推翻過去普遍以為市參議員為間接選舉的誤解，甚至將將人口數、投票選舉人數、候選人數、當選機率等整理表列，說明戰後初期高雄市民對選舉的冷漠態度，挑戰過往的看法，相當具有說服力，其次，論文中以甚少被使用的《國聲報》、《中華日報》等史料，輔以大量的口述歷史，鋪陳戰後高雄政局與浩劫後高雄後的高雄市參議會。鄭志敏近年來專心致力於高雄地區政治史的研究，其有關日治時期高雄市會議員選舉，³ 就曾展現在史料方面所下的工夫，本文持續在史料上努力開發，用心的態度值得肯定。

劉熙明的論文〈再論蔣介石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責任：由蔣介石在國共內戰的作為來分析〉也企圖在二二八議題的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但成果令人十分擔心。此文的基本論點是：特務要殺害重要人士，必定要經過蔣介石的許可，所以臺灣菁英如林茂生、張七郎等中央民代，必然是蔣介石下令；蔣下令殺人是用口諭，不留文字檔案，必且不會在日記中記載，以規避歷史審判，此為蔣介石的行為模式；蔣在國共鬥爭中以特務殺害共產黨，推論在 3 月 7 日以後二二八處委會人員被視為「奸黨叛徒」，蔣遂從懷柔改為暗殺與高壓。全文史料所提供的證據甚為薄弱，以邏輯推論為主，但其邏輯充滿矛盾與謬誤。例如，作者所有推論的前提「特務殺害重要人士，一定是蔣介石指示」，就站不住腳，例如文中也說聞一多被殺害，非蔣所下令，事後蔣予以掩護，就與作者的前提自相矛盾。其次，蔣介石的軍特人員貪污、濫權、草菅人命，史料多有記載，為何作者獨信特務紀律整然、聽命而行？再者，蔣介石在日記上未記載者，作者即認為必然確有其事，且是以口諭暗殺，邏輯上更是荒唐。論文中，作者毫不掩飾他的偏見，例如指稱中統派遣劉戈青、何芝園來臺必然是為執行暗殺任務，但軍統在臺特務甚多，有必要特派殺手來臺執行任務嗎？又，文中屢屢以「如果不是私仇……當然就是直接聽命於南京」，「陳儀與柯遠芬應該不敢任意濫殺中央民代……故合理判斷他(蔣)無法迴避是殺害林茂生的主使人」等，憑空推論，全無可靠史料支撐；如此充滿跳躍論證、邏輯矛盾、大膽推論作品，大大挑戰臺灣史學界的學術紀律。

在史料缺乏的情況下，劉熙明或許希望以邏輯推演為蔣介石責任問題另闢蹊徑。但，筆者認為，對於這樣高度爭議的課題，學術界不但要更謹慎處理，更必須有堅實的史料為根據。率爾想像、憑空論證，甚至建立在謬誤的邏輯推演上，這不但不是二二八研究方法上的突破，反而會對臺灣史研究造成重大傷害。

同樣是探討蔣介石在二二事件中的責任問題，臺灣大學歷史所蘇聖雄的碩士論文〈「奸黨煽惑：蔣中正對二二八事件的態度與處置」〉一文，則展現的紮實的史料考證工夫。本文利用《蔣介石日記》、《事略稿本》與先前已出土的檔案史料細密比對，重建事件過程中陳儀、中統、軍統、中央社等、處委會等所提供之資訊與蔣介石決策之經緯，其中如考證陳儀請兵時間等細節，都頗有說服力。但作者的史料考證都在證明蔣介石之派兵為必然的選擇：事發之初蔣介石即認定共黨作亂所以

³ 鄭志敏，〈日治時期高雄市臺籍人士地方自治參與之研究〉，《高市文獻》20：1，2007.03，頁 58-153。

派兵、種種反對派兵的言論蔣知聞不多、對於臺灣人民被屠殺訊息蔣所知不多故未懲處、在國共對峙的情勢下蔣之派兵為歷史必然等等，對蔣介石的處境充滿設身處地的理解，卻對廣大受害的臺灣民眾未及一顧。此研究成果執著於歷史同情，卻忽視歷史解釋與判斷，⁴ 殊為可惜。

朱宏源與王呈祥的作品，批判的對象則是 George H. Kerr。朱宏源的〈美國政府背叛臺灣：校讀 George Kerr 編撰 *Formosa Betrayed* 時的內心世界〉一文，宣稱採「科學的勘驗之法：包括內容校勘、根據的驗證、歷史的重觀、外交學的知識」，但文中卻不斷出現主觀的文字：如指 Kerr 充滿心機、邪惡；認為《被出賣的臺灣》一書在李登輝、陳水扁主政下，由官方公開支持，使其影響力超過二二八事件本身；指控 Kerr 在事中慫恿暴徒毆打外省人、資助臺灣人地下武裝組織，卻未提出具體證據。朱宏源宣稱「真正的歷史學者，須要能以心中沒有意識形態的超然態度，來研究意識形態」研究 Kerr 的心態，但其痛恨 Kerr 的措詞與心態，同樣應該加以批判。王呈祥的《美國駐臺北副領事葛超智與「二二八事件」》一書，在前半部他對相關史料檔案細心比對，對有關 Kerr 的學經歷、二戰中美軍佔領臺灣決策的轉折、開羅會議中美英態度的差異等等，都展現史料考徵的用心，言之有徵。並且，對於部分疑點，作者比對史料，但不妄下結論的處理方式，也甚為可取。但是第三章以後出現明顯的偏頗：其一，他批判 Kerr 對事件的看法不公，對大使館的報告同情臺灣人，將處委會與臺人描述為理性而有效率；如果這樣的指控成立，則王呈祥也犯了同樣的錯誤，因為他對二二八事件過程的敘述完全採用另一方的說詞——官方說法，並且特別偏重臺灣人殘酷虐殺外省人的描述。其二，推測陳儀遭到撤換，是因為 Kerr 的報告書影響所致，證據不足，也過度誇大 Kerr 的影響力。其三，推論 Kerr 致送南京大使館的臺灣人〈致馬歇爾將軍之陳情書〉使中央政府確信美國介入臺灣叛變，是造成蔣介石派兵鎮壓、臺灣人菁英遭屠殺的主因，Kerr 是二二八事件無法善了的罪魁禍首一節，更是荒腔走板。

2009 年二二八事件研究的成果中，再一次凸顯學術與政治分際的問題，學術研究不可能沒有立場、成果其可能有利於某種政治立場與陳述。但是，怎樣的研究可符合學術規範，可以被學界所接受？怎樣的研究會挑戰學術研究專業，超出學術研究的容忍範圍？是臺灣史學者必須共同思考與面對的課題。

2、白色恐怖研究

白色恐怖案件研究，也是多年來的研究重點，並累積了可觀的成果。2009 年吳三連基金會舉辦了一場「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學術研討會」，會後並將所發表的論文成集出版。《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論文集》共收錄 14 篇論文，

⁴ 歷史想像與同情固然是歷史研究者的重要能力，但歷史解釋與判斷同樣不可偏廢。杜維運引用 Lord Acton 之說：「正義永遠為正義，慈悲永遠為慈悲……殺戮不因時間不同而非殺戮，迫害、詐偽、自私的野心，無一而非邪惡」，史學工作者失去了判斷的標準，將使歷史研究無所歸依、失去價值。見杜維運，《史學方法論》，臺北：三民書局，1995，頁 201-226。

可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薛化元的〈威權體制的建立〉一文從戡亂/戒嚴、反共/強人、黨國體制、司法控制面向討論臺灣威權體制的特徵；陳翠蓮的〈臺灣戒嚴時期特務統治與白色恐怖氛圍〉分析戰後臺灣特務系統的建立、複式監控、社會控制手段、恐怖社會的形成；許建榮與陳美蓉分別研究國民黨政府在美國與日本對海外留學生的監控手段；李筱峰討論戒嚴時期政治犯的遭遇與處境，這 5 篇論文偏重威權體制與社會控制手段的探討。第二部分有 9 篇論文，分別討論山東煙台案、學委會案、省工委會左翼案件、鹿窟案、臺獨案件、原住民政治案件、情治機關內鬥案件、壓制民主動引發之案件、言論案件等，這些論文最大的特色是，利用 2008 年國防部情報局等機關移轉開放的白色恐怖政治案件第一手檔案，進行個案分析。整個論文集規劃完整，幾乎可稱為是白色恐怖研究報告。黃翔瑜的〈山東流亡師生冤獄案〉與林正慧的〈1950 年代左翼政治案件探討：以省工委會及臺盟相關案件為中心〉，大抵不出上述範圍。淡江大學歷史所蔡西濱的碩士論文〈中共第下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1946-1950)：以臺北市地區為研究中心〉，試圖重建中共省工委會在臺北地區的組織與成員，並分析成員背景與特性，但因為檔案的限制，成效十分有限。

另一值得討論的作品是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蕭伶仔的碩士論文〈走進「白色家庭」：一九五〇年代政治受難者家屬生命歷程探究〉。有別於一般白色恐怖研究多著重於法律或體制面，蕭文關心的是在國家暴力下受害者家屬的真實的、日常的生活樣貌，她以大量的口述訪問，包括 42 個受難者家庭、4 位基層員警，探討「白色家庭」所承受的日常國家暴力，及其生存策略，並比較白色恐怖對於不同階級受難者家屬的影響，在白色恐怖研究的課題上有所拓展。尤其，針對監視政治犯家庭的管區警員進行口訪，將國家暴力結構一環的說法，與政治犯家屬說法對照，更可看見其在口述史料方面盡力有所突破的努力。比較可惜的是，碩論中未將口訪紀錄作為附錄。

3、1949 流亡書寫

2009 年正好距國民黨政府來臺一甲子，一時之間，有關 1949 年的「流亡書寫」成為充斥坊間。這一現象頗值的注目，更重要的是，1949 年書寫在臺灣史研究究竟應該如何定位。相關出版品中，有些是通俗之作，有些是學術專著，筆者擬分別討論。通俗作品中，資深記者林博文的兩書：《1949 石破天驚的一年》收錄冷戰時期中美臺之間戰爭、外交、情報戰、臺灣地位等小故事，甚至論及美國中央情報局插手 1989 年天安門民運內幕；《1949 浪淘盡英雄人物》則收錄冷戰時期中美臺的政治人物、外交官、軍事將領、新聞記者逸事與特寫，儘管文筆生動，有時也參考美臺官方檔案或相關人士回憶錄，但認真說來兩書與 1949 並無明確關連。曾健民近年來作品極多，大約保持一年兩本書的產量，《1949 國共內戰與臺灣：臺灣戰後體制的其源》是他的新作。本書約一半的篇幅在敘述國共內戰，另一半篇幅描述陳誠為主的政治戒嚴、入出境管制、戶口總檢查、三七五減租、幣制改革、美國對臺政策、中央政府遷臺與省府改組等等，由於所論遍及戰爭、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

課題甚多，大都只能概略敘述，難以深入。

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是這一年的倡銷書，作者以她一貫充滿感情的筆調提問「戰爭，有勝利者嗎？」，立於人道主義立場的書寫位置，取得了道德上的優勢。細觀全書，有三分之二內容是 1949 年外省人來臺的流亡書寫，三分之一是有關臺灣人經歷二戰、國共內戰的戰爭書寫。雖然書名是叫「一九四九」，但其實只是外省人的 1949、顛沛流離的故事；關於臺灣人的部分，全然不提 1949 年國府遷臺後臺灣人的處境與感受。筆者認為，龍應台對外省人的流亡與流離如泣如訴，文中雖然也對臺灣人表示同情，但卻是將故事巧妙嫁接到二戰時期臺籍日本兵與戰俘營的遭遇，暗示陷臺灣人於不幸境地的是日本人，卻迴避 1949 國府遷臺對臺灣人與臺灣社會的衝擊，不無移花接木之嫌。其次，全書描述戰爭的無情，意即無論本省人、外省人，大家都是受害者。但是，如此的歷史浩劫，是誰造成？誰是加害者？誰該為慘烈的戰爭所造成生靈塗炭負責？龍應台無語，更是有避重就輕之嫌。

張玉法等人編輯的《紮根臺灣六十年：百萬人的奮鬥、成長、融合》，共有五冊，收錄中國十八個省份隨著國民黨政府遷臺的外省人的回憶文章，共七十萬餘言。這一套回憶文章，據編輯委員王德毅所言，是要為現代史留下史料，尤其是要彰顯外省人來臺，在各領域的貢獻，說明臺灣本是移民的天堂。但筆者所見，這些數量慎為龐大的回憶文章有幾個特色：一、撰文者以軍公教人士為主；二、撰文格式相同，分為家世、來臺經過、在臺奮鬥經歷、特殊事蹟與貢獻等節，多以個人身世、流亡的苦難、在臺發展為主；三、對威權體制、戒嚴統治幾無所感，即使是山東人所親受的白色恐怖案件如澎湖案也輕描淡寫。雖然書名為「紮根臺灣六十年」，但內容圍繞在個人的成家立業，與戰後臺灣社會發展、民主化進程等重要課題甚少呼應，是相當自說自話的「外省人在臺發展史」。

學術論著有林桶法的《1949 大撤退》與劉維開的《蔣中正的一九四九：從下野到復行視事》兩書。林桶法以大量史料鋪陳蔣介石、行政院及政府機關、外省人如何遷臺為主軸，兼及文物遷臺、太平輪事件、山東流亡學生案，外省人抵臺後的觀感等等，主題明確鎖定國民政府與外省人的撤臺，結論認為，這一大批的政治移民與外省菁英無疑是臺灣的一股動力，對臺灣的文化、學術都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對臺灣經濟發展更是功不可沒，惟獨族群矛盾成為日後棘手的問題。劉維開更將焦點集中在 1949 年 1 月蔣介石下野到 1950 年 3 月「復行視事」的一年多的時間內，使用蔣中正日記、國史館與國民黨黨史會所藏的檔案細密爬梳，文中指出，蔣介石下野後對政局採取關心而不介入態度，但因情勢嚴峻、無法置身事外而插手政局；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無法掌控全局，和談失敗、進退維谷；蔣介石下野時並未盤算日後出處，而是因為李宗仁不負責任赴美、蔣介石堅守到最後、個人影響力未減等因素，在行政部門支持下才復行視事；且「因故不能視事」與「辭職」不同，復行視事並不違法；蔣的復出，對政府運作與民心士氣軍有積極作用。林桶法、劉維開的研究都依賴大量官方檔案或官員日記，所書寫的 1949 與臺灣社會幾乎沒有關連，結論所強調外省人的貢獻、蔣介石不得不重出江湖，也與社會認知有些落差。

上述 1949 年史幾乎等於是外省人的流亡書寫。林桶法與劉維開的研究被定位在「中華民國史」的範疇，雖然 1949 已經過了六十年，中華民國史所討論的 1949 年，臺灣、臺灣人、臺灣社會仍然不是被關注的主體，中華民國史所書寫的蔣介石與臺灣人眼中的蔣介石幾乎是兩個人。臺灣史研究應該如何處理這樣的關鍵年代？1949 的臺灣史應如何書寫？臺灣史與中華民國史是否始終是各說各話的兩條平行線？

類似的形如東海大學歷史所許順昇的碩士論文〈流亡世代的政治構思：《民主評論》的國家論述(1949-1966)〉，以《民主評論》為主的一群流亡港臺的中國知識份子的救亡意識，是臺灣史研究甚少關切的課題。究竟，港臺中國知識份子的論述與行動，是否應該納入臺灣政治史的研究範圍？應該居於何種座標位置上，是十分值得討論的問題。

4、戰後政治史的其他課題

戰後初期研究中，蘇瑤崇與馬有成都重新探討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體制問題。蘇瑤崇的〈論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軍事佔領體制」及其問題〉一文比較了總督府制、省政府制與長官公署制，強調國民政府統治下「署」制所具有強烈的軍事綏靖意味，誠為可信；但論文後半部轉向陳儀政府的濫權腐敗、並稱之為「奸商政府」，與前半部的討論無甚關連，甚為可惜。文中確信，國府接收臺灣並非主權轉讓，卻又認為臺灣人應享有中華民國憲法權利，不無矛盾。馬有成的〈戰後初期國府接管臺灣之籌劃〉，運用檔案管理局所藏之臺灣省文獻會、國史館、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案，說明開羅會議之前國民政府閃避臺灣歸屬問題；戰後與國府與盟軍協力，以軍事體制佔領臺灣，此乃臺灣調查會的研究規劃束諸高閣之主因；說明中美合作佔領臺灣的具體事實等，無論在史料與觀點上，均有突破，是篇相當紮實的佳作。

戰後威權體制與社會控制也是多年來持續被關注的課題。這類研究又可分為幾類，一是社會控制機制，有關的研究包括臺大歷史所黃惠貞的碩士論文〈國民黨政權流氓取締制度起源研究(1927-1955)〉，企圖對流氓取締制度作跨時性的研究，探討此制度與中國大陸的統治經驗與日治浮浪者取締經驗間的關連。但是，本文有許多關鍵問題都未釐清，例如將流氓、遊民、土豪劣紳、散兵游勇的取締與收容管訓當作同一回事，不無疑問；二二八事件後流氓與奸匪如何被等同視之，說明不清；警備總部取締地痞流氓為何成為「情報保防業務」？政府當局是否以流氓管訓的手段對付政治反對者？都未予交代，使得全文留下的疑問比解達的還多。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馮琳的〈論國民黨改造時期的社會調查(1950-1952)〉一文，注意到「社會調查」不同於特務工作，但又具有保密防諜的用途，本文雖然仍停留於國民黨黨務工作宣傳品的整理分析，對社會調查工作的實際狀況與作用還有待進一步討論，但仍然提示了威權統治時期社會控制研究的另一個切入點。許建榮的〈國府統治時期對海外留學生的監控：以美國為例〉，以 1970-1990 年代美國媒體對國民黨特務學生校園活動的報導，加上對留美學者的口述訪問，相當清楚地呈現了國民黨政府對在美國臺灣留學生進行監控的大致面貌。本文的研究課題具有高度敏感性，但作

者以充份的史料鋪陳，相當具有說服力。在政府當局尚未全面公開戒嚴時期情治機關檔案的情況下，本文作了大膽且成功的嘗試，也為臺灣的轉型正義研究開啓另一種可能的研究途徑。

二是文化控制機制。政治大學歷史所林果顯的博士論文〈一九五〇年代反攻大陸宣傳體制的形成〉，希望探討「反攻大陸」宣傳的內容、手法、變化與對臺灣社會的影響。但全文有不少缺失：限於史料，對於宣傳體制的探討甚弱，甚至對黨國體制決策方式相當生疏，以致題目與內文不符。文中對於中日總動員體制類似性未進行考證與追查，即主觀認定。文中也出現不該有的錯誤，例如戰爭末期臺灣唯一報刊是《臺灣新報》而非《興南新聞》等等。然而，此論文最大的問題在於大量引用各種理論、概念與研究取向，例如意識形態(ideology)、論述(discourse)、國家建造(state-making)、日常生活(daily life)、知識倉庫(stock of knowledge)、貫戰史(transwar)等。這些理論或概念在文中未有充份說明即被任意使用，適當與否不無疑問。例如，不同理論各有所重、甚至有所衝突，如何放在同一論文中同時運用？「意識形態」與「論述」可以被當作同一概念使用嗎？戰爭有助於國族建構(nation-building)與國家建造(state-making)，是指對外、敵國之戰，但內戰(civil war)也可以一體適用嗎？宣傳標語可以被當作是「印刷資本主義」嗎？本文宣稱是日常生活的研究取向，卻用法律與制度來呈現是否適當？歷史研究需要這樣大量的、任意的使用理論嗎？

李筱峰〈兩蔣威權統治時期「愛國歌曲」內容析論〉一文，收集了 315 首兩蔣時期的所謂愛國歌曲，進行內容分析，歸納出反共抗俄、個人崇拜、大中國認同等 15 項特色，並以之說明兩蔣政權的法西斯性格。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吳泰豪的〈《大學雜誌》政治主張之研究：以 1971 年至 1973 年為中心〉一文，對《大學雜誌》中有關外交問題/中華民國前途、青年/學運、中央民代改選/選舉/反對黨等課題進行內容分析，指出該刊重視理念宣傳，缺乏實踐與行動的特性，均是平實的作品。文化大學中山所莊綱峰的碩論〈臺灣戒嚴時期愛國電影的政治傳播 1974-1986〉，並不是新的課題，但論文主文的幾章連註釋都沒有，完全不知所據；序論指出將以深度訪談為主要研究方法之一，結論中竟稱並未執行；顯示國內部分論文品質的管制令人擔憂。

(三)日治研究與戰後研究的共同課題

1、人物研究

人物研究也是 2009 年成果的特色之一。中興大學歷史所三篇碩士論文，包括戴宛真的〈李萬居研究：以辦報與問政為中心〉、蕭碧珍的〈動盪的年代：戰後初期魏道明主持臺灣省政研究〉與楊淳涵的〈謝東閔研究：以省議會時期問與主持省政為中心〉，都強調研究對象的卓越貢獻，將人物研究寫成偉人傳記，卻未處理傳主生涯中的偌大的疑點。例如，李萬居為何在二二八事件中無法獲得民間的諒解，又

失去官方的信任？作者所說治績卓著的魏道明為何任期只有短短一年多就下台？號稱對臺灣社會貢獻良多、影響深遠的謝東閔為何會被郵包炸彈攻擊？諸如以上的問題未加處理，使得此些人物研究流於平面化、官式化、表面化，不能算是成功的作品。

楊渡所著的《簡吉：臺灣農民運動史詩》，是一部半文學性質的作品，又因為此書的出版與簡吉家屬關係密切，無法以史學研究標準要求之。書中特別強調日治與戰後二二八事件中左翼勢力及共產黨的活躍角色，及簡吉等左翼人士的犧牲奉獻、從不出賣同志的節操。全書充滿英雄式、史詩式的風格，但缺少人性掙扎的立體感，尤其錯字多到令人無法忍受的地步。馬英九擔任國民黨主席以來，力求「與臺灣連結」，蔣渭水是連結的樞紐，角色定位也從「臺灣的先知先覺者」變成了「臺灣的孫中山」。⁵《第一屆蔣渭水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正是在政治正確與家屬大力促成下的產品。本書除蔣渭水之孫蔣朝根的論文外，另收錄了年青研究者的論文9篇。其中，邱士杰的〈蔣渭水與臺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起源：從新臺灣聯盟、社會問題研究會到無產青年〉分析臺灣社會主義運動與島外的關係與變化，及蔣渭水思想的流動性與角色的曖昧性，史料與觀點均具說服力；劉智濬的〈《臨床講義》的現代性渴望〉一文，透過阿圖塞的「徵候式閱讀」(symptomatic reading)分析，詮釋上別有見地。其他多篇文章闡述蔣渭水在農民運動、翻譯活動、與甘地論述的比對、文學理路等方面的貢獻或成就，有明顯的溢美與附會之處。所有成功的政治、社會運動，都需要思想家的論述、資產家的資金挹注與活動家的鼓舞宣傳等各種角色的分工合作，缺一不可，如今卻把日治時期政治社會運動所有榮耀歸於一人，將之視為在理論、翻譯、文學、運動個面向無所不能，並非忠於史實的研究。令筆者油然而生起才將「中山先生」拉下神壇、⁶又將「渭水先生」送上神壇的荒謬感。臺灣史人物研究如上述的平面式書寫、或是作為學術酬酢、或是作為政治奴婢的現象，應該被大力改革。

2、區域研究與地方菁英研究

區域研究、地方菁英研究在臺灣史研究中行之有年，2009年也有相當的研究成果，大約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如暨南大學歷史所邱正略的博士論文〈日治時期埔里的殖民統治與地方發展〉，及文化大學史學所賴盟騏的博士論文〈彰化縣政治菁英之研究(1945-2007)〉。邱文內容極廣，包括地理環境與行政變遷、統治方針與重大事件、土地開發與地方發展、人口變遷與族群結構、地方菁英與埔里發展、埔里街政與街民生活，幾乎無所不包，邱自承是繼劉萬枝所寫《臺灣埔里鄉土志稿》基礎上的繼續之作。賴文題目雖訂在戰後，內容卻是從清治以迄於2007年，同樣包括

⁵ 黃煌雄，《臺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先生》，臺北：撰者印行，1976。黃煌雄，《蔣渭水傳：臺灣的孫中山》，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⁶ 〈紀錄片製作人平路：只想講個動聽故事〉，2010年8月10日，聯合新聞網，udn.com/NEWS/FOCUSNEWS/NATS6/5778872.shtml

彰化人口與產業結構變遷、政治菁英與歷屆政權轉移、各類政治菁英名單與遞嬗、地方議會派系與政治發展。兩篇博士論文都花費許多力氣搜集了豐富的資料、地圖、地方家族與菁英名單等等，但是分析討論十分薄弱，將地域研究當成地方志的方式書寫，史料整理遠遠強於史料分析，相當可惜。

中央大學歷史所李亮霆的碩士論文〈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對地方社會的控制與回應：以新庄為例〉與政治大學臺史所陳立家的碩士論文〈日治時期臺中地區地方菁英的重塑(1895-1935)〉，都在討論總督府的社會控制、與地方菁英的關係，也都關心地方菁英對於統治當局的回應，研究課題相當接近。日治時期的地方行政可略分為兩個系統，一是警政系統，包括警察與保甲；一是民政系統，如街庄長、區長，或參事、協議會等諮詢機關，李文著重保甲、警察、教育制度對地方統治的統合，並盡力使用一手史料，值得肯定。但欲使用「殖民治理性」(governmentality)分析時，卻對該概念無法準確掌握；又說要使用布迪厄的「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概念分析，最後卻無疾而終。陳立家的論文以大量一手史料梳理臺中地區地方菁英如何備整編入地方諮詢機構與基層行政體系，並以防治鼠疫為例，檢驗地方菁英的協力與自主性，表現可圈可點。政治大學臺史所黃仁姿的碩士論文〈外來政權與地方菁英：以 1950 年代農會改組為例〉，挑戰過去研究以二二八事件為臺灣政治菁英斷層的分水嶺的看法，追查農會幹部的替換，發現二二八事件後原有農會幹部仍有高達 81% 的延續率，經過幾次農會整頓與會員資格設限，到 1953 年農會幹部有明顯斷裂，國民黨始將農會系統的地方菁英收編成為其統治基盤。全文將一手史料整理後，並以量化方式呈現，相當具有說服力。

以上可見，論文的精彩與否，與問題意識有關，與充份的史料證據有關，但與理論與概念的使用未必相關。歷史系所的學生除了要能使用與整理史料，如果問了重要的問題，在明確的問題意識下追根究底，就可以產生言之有物的研究成果。理論與概念如果使用不當，反成敗筆。

3、軍事與戰爭史

2009 年日治史與戰後史也出現多篇軍事與戰爭史的研究成果。陳柏棕的〈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之殤：特設巡洋艦護國丸遭難始末〉一文，從 1944 年 11 月護國丸遭美軍潛艦擊沉，造成臺灣海軍志願兵 212 人的重大傷亡事件，探討戰時日本海軍海上護衛機制問題。全文以充分的一手史料、官方報告、當事人回憶錄等鋪陳戰時日本海軍護衛機制與事件經過，指出海軍方面的「傳統艦隊決戰主義」戰略思想，使得海上護衛兵力缺乏整備、形同虛設，是事件發生的主因，證據與論證完整而具有說服力。尤其，本文在海軍史、軍事專業知識上力求精確，可說是相當成功的「小題大作」的作品。王韶君的〈戰爭與儀式：日治時期「海軍記念日」的制定與宣傳(1905-1944)：以《臺灣日日新報》為中心〉雖然自我定位為海洋史的研究，但是內容其實是日俄戰爭以來日本帝國的海權爭奪與宣傳。本文只能算是此課題的粗略描述，一些重要問題並未獲解答，例如 1905 年起的「海軍記念日」與 1944 年起的「海

的紀念日」兩者的性質、意義的同與不同？兩節日的關係如何？為何不合併或將前者廢止？又，只以《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為材料，分析該節日的宣傳，文本太過單薄。林呈蓉的〈太平洋戰爭時期臺灣的社會變革：以《新建設》記事為中心〉一文，比較像是《新建設》雜誌的史料介紹，說明作為作為皇民奉公會宣傳刊物的該雜誌，在戰爭的各個時期的報導重點。結論中認為戰爭時期所強調滅私奉公的社會道義、守望相助的鄰保精神、賢妻良母的婦女形象、公益優先的義勇報國隊精神、徵兵制的施行等「近代社會中所具有普世價值的言動，給臺灣社會民度的提升帶來了正面效益」云云，也不無疑問。

臺灣大學政治所李銘藤的碩士論文〈中華民國戰爭動員體制之政治經濟分析(1912-2008)〉，因為探討課題太多、時間跨幅太長，遂出現大而無當的弊病。東海大學社會所楊金柱的博士論文〈混血的現代性：冷戰體系下的臺灣軍隊(1949-79)〉，對所謂「現代性」概念有完整的考察，透過美國化的體制與裝備、在地的政工制度、反共戰爭的文化宣傳、蔣介石的權力行使等面向，探討所謂臺灣軍隊的「混血」性格。但是，本文雖宣稱採歷史社會學的視野，卻在史料使用上片段而破碎、去脈絡化，無法完整呈現臺灣軍隊建立時的歷史結構與情境，結構完整的導論與行文渙散的各章，恰成強烈對比。

三、2009 年臺灣近現代政治史檢討與展望

整體來說，2009 年臺灣近現代政治史究成果有以下給個特色：

- (一) 近現代史為主要研究成果：2009 年政治史的研究成果中，早期與清代臺灣史筆數甚少，日治與戰後史佔絕大多數，達七成六。
- (二) 研究課題甚少創新：臺灣近現代政治史的研究成果雖然佔政治史總成果的絕大比例，但主要研究焦點多是舊課題的延續，鮮少新課題的開發。2008 年的果以二二八研究、白色恐怖研究、威權體制研究、外交與涉外事物究為主，而前三者仍是 2009 年的熱門研究課題。日治史亦然，警察、保甲、籍民、地方菁英、政治認同等，都是舊課題。較新的進展是「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的建立，提供了法律史研究全面開展的契機，但受限於法律專業知識的學術門檻，歷史學者跨入法律史研究者仍不多見，尚待努力。
- (三) 史學者的理論焦慮症：前文可以發現，2009 年研究成果中有不少臺灣史研究者大膽地使用理論，甚至過度的使用理論，反造成作品的重大缺失。也有社會學或政治學研究者雖然可以梳理理論架構，但在史料運用上一塌糊塗，無法驗證所提出的架構。去年的研究成果中的好作品，大多是不靠理論附麗，而是建立在紮實的史料基礎上。年輕研究者在舊課題上進行更細膩的探討，或者與學界重要觀點對話，其所提出具有說服力的看法，多是以一手史料的運用為主。筆者認為，部分研究者努力於一手史料的梳理與解讀，應該獲得大大的肯定。

(四) 政治與學術研究分際問題：2009 年二二八事件研究的成果中，仍可以看到政治偏見影響學術研究的情況甚為嚴重，尤其是二二八事件、蔣介石研究、人物研究上，少數成果甚至挑戰學術研究的容忍極限。

過去一年，臺灣近現代政治史研究成果銳減，並且似乎沒有太大的突破、或卓越的表現。展望未來，筆者提出以下幾點想法與建議：

(一) 有關政治史的定義與範圍：在 2009 年《文獻類目》中所臺灣政治史成果筆數較 2008 年大幅減少，但筆者翻閱類目發現，社會史與文化史研究成果與政治史有許多重疊之處，甚至有不少研究成果可以劃分到政治史領域。目前的劃分方式，似乎將政治史定位在官方行使權力的體制、機構、政策，與民間對抗權力的政治運動、政治事件等。政治史的主要重點在分析權力的運作，但權力運作可以是具體可見的體制，以也可柔性隱晦的各種操作。目前的分類方式較偏重前者，輕忽後者，例如教育、文化如何操作；記憶與認同如何塑造；儀典與節日灌輸認同；知識份子的思想與行動如何挑戰或附和權力當局等等，都可視為政治史研究的範圍。筆者記憶所及，這類論文在 2007 年歸於政治史範圍，⁷ 但今年多被劃分到社會史或文化史的範圍，這可能是今年政治史成果筆數銳減的原因之一。如何定義政治史？是應該被重新思考的課題。

(二) 臺灣戰後政治史與中華民國史的對話：長期以來，臺灣戰後政治史與中華民國史是兩個不同的範疇，雖然自 1945 年起的歷史兩者交疊，但雙方各說各話，幾乎成為兩條平行線。其結果是，臺灣史與中華民國史中的蔣介石似乎是兩個人，一個是暴君、獨裁者，一個是偉人、民族救星；臺灣史不太關心島上的外省族群，中華民國史眼中沒有臺灣人民。1949 年外省人撤退到臺灣來，我們看到有關一百萬外省人的流亡書寫，但島上的七百萬呢？他們的社會與命運受到怎樣的衝擊？又，外省人到來之後與臺灣人如何互動？產生怎樣的機制與後果？又，臺灣人眼中的蔣介石與外省人眼中的蔣介石有沒有產生共識的可能？歷史研究與當代社會密切相關，有共識的歷史可以成為政治認同的基礎。由此，筆者認為歷史研究者責任重大，臺灣史與中華民國史的對話，是臺灣社會形成共識與認同的第一步。

(三) 政治立場與學術研究的分際問題：如前所述，學術研究與當代社會密切相關，不可能完全客觀、中立，多少會受到研究者立場的影響。但這並不表示，學術成為政治的奴婢、以學術之名為政治服務，應該受到容忍。尤其在立場嚴重對立的臺灣社會，如何建立應有的學術規範，是臺灣史學者無法迴避的問題。要避免學術研究淪為政治立場論述，一方面研究者須誠實面對自己，檢視自己的研究是否謹守史料、考證、論證等學術規範？一方面臺灣史學術社群應該建立嚴格的評審機制，基於史料與論證的學術規範與要求，批判或淘汰為政治服務的作品。如此，臺灣史研究成果的品質與聲譽才能夠穩固確立。

⁷ 陳翠蓮，〈臺灣政治史研究的新趨勢：從抵抗權力到解構權力〉，《漢學研究通訊》28：4，2009.11，頁 1-9。

(四) 史料與理論孰輕孰重問題：臺灣史學者的「理論焦慮症」，幾年來都是本研討會上被關心與討論的課題。今年的成果告再一次說明，好的臺灣史學術作品，先要有重要的提問，次要有紮紮實實的史料解讀與分析。社會科學的諸理論本非史學者所長；臺灣史研究者不須捨近求遠、本末倒置，勉強使用不熟悉的理論虛張聲勢。就算一定要用，也宜求精不求多，切勿搭乘學術熱潮、求新求炫，反而貽笑方家。

序號	作者、編者	篇名	刊名、出版社
1	王呈祥	《美國駐臺北副領事葛超智與「二二八事件」》	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9
2	王祥豪	〈日治後期國家法對政治異議者的處置〉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3	王景弘	〈美國報紙處理〔二二八事件〕新聞之分析：以《紐約時報》為例〉	收入楊振隆編，《大國霸權 or 小國人權：二二八事件 61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學術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9，頁 370-413。
4	王韶君	〈戰爭與儀式：日治時期「海運紀念日」的制定與宣傳（1905-1944）——以《臺灣日日新報》為中心〉	《臺灣風物》，59：3（2009.9），頁 87-128。
5	王學新	《日治時期臺灣保甲制度之研究》	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9。
6	王學新	《日本對華南進政策與臺灣黑幫籍民之研究（1895-1945）》	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9。
7	井上一宏	〈日治時期臺灣人民國家認同之探討：以公學校修身教育為主〉	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8	李玉瑾編	《臺灣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殖民與近代化論文集》	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09。
9	李幸真	〈日治初期臺灣警政的創建與警察的召訓（1898-1906）〉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10	李亮霆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對地方社會的控制與回應：以新莊郡為例〉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9。
11	李明峻	〈二二八事件與個人國際賠償請求問題〉	收入楊振隆編，《大國霸權 or 小國人權：二二八事件 61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學術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9，頁 275-305。
12	李筱峰	〈兩蔣威權統治時期「愛國歌曲」內容析論〉	《文史臺灣學報》，1（2009.11），頁 135-178。
13	李筱峰	〈臺灣戒嚴時期政治犯的遭遇與處境：政治受難者的經驗見證〉	收入張炎憲、陳美蓉編，《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論文集》，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9，頁 383-423。

14	李歷芬	〈日本殖民時期臺灣的民族主義之研究(1895-1945)〉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15	何義麟	〈1930年代臺灣人的國族認同：以臺中「東亞共榮協會」之發展為中心〉	《文史臺灣學報》，1(2009.11)，頁247-268。
16	何義麟	〈二二八事件前後之自治爭論：從「臺灣勿特殊化」問題談起〉	收入楊振隆編，《大國霸權 or 小國人權：二二八事件 61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學術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9，頁125-162。
17	沈德汶	〈獄犴之眼與鱸鰻先生的交陪〉	收入蔣朝根編，《第一屆蔣渭水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蔣渭水化基金會，2009，頁167-186。
18	吳泰豪	〈《大學雜誌》政治主張之研究：以1971年至1973年為中心〉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19	吳嘉純	〈從《人民導報》看戰後初期臺灣的文化適應與社會衝突〉	收入楊振隆編，《二二八歷史教育與傳承學術論文集》，臺北：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9，頁15-44。
20	何鳳嬌	〈戰後初期臺灣軍事用地的處理〉	《國史館館刊》，19(2009.3)，頁91-131。
21	林正芳	〈蔣渭水與宜蘭：兼論日治時期宜蘭地區的社會運動〉	收入蔣朝根編，《第一屆蔣渭水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蔣渭水化基金會，2009，頁84-102。
22	林正慧	〈1950年代左翼政治案件探討：以省工委會及臺盟相關案件為中心〉	《臺灣文獻》，60：1(2009.3)，頁395-477。
23	林正慧	〈1950年代親共或左翼政治案件〉	收入張炎憲、陳美蓉編，《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論文集》，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9，頁13。7-188
24	林呈蓉	〈太平洋戰爭時期臺灣的社會改革：以《新建設》記事為中心〉	《臺灣史料研究》，33(2009.6)，頁61-85。
25	林宏一	〈封鎖大陸沿海：中華民國政府的「關閉政策」，1949-1960〉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26	林欣怡	〈二二八與轉型正義〉	收入楊振隆編，《二二八歷史教育與傳承學術論文集》，臺北：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9，頁521-550。
27	林果顯	〈一九五〇年代反攻大陸宣傳體制的形成〉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
28	林桶法	《1949年大撤退》	臺北：聯經，2009。
29	林博文	《1949石破天驚的一年》	臺北：時報，2009。
30	周宗賢	〈論噍吧哖事件的發生與政治、社會、經濟的關係〉	《淡江史學》，20(2009.3)，頁63-89。

31	邱士杰	〈一九二零年代臺灣社會運動中的「大眾黨」問題〉	收入若林正文、松永正義、薛化元編，《跨域青年學者臺灣史研究續集》，臺北：稻鄉，2009，頁 129-184。
32	邱士杰	〈蔣渭水與臺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起源：從新臺灣聯盟、社會問題研究會到無產青年〉	收入蔣朝根編，《第一屆蔣渭水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蔣渭水化基金會，2009，頁 27-48。
33	金貞和	〈韓國人看二二八與臺灣意識〉	收入楊振隆編，《大國霸權 or 小國人權：二二八事件 61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學術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9，頁。
34	范燕秋	〈原住民菁英的整肅：「湯守仁等叛亂案」〉	收入張炎憲、陳美蓉編，《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論文集》，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9，頁 221-252。
35	侯坤宏、王振華	〈文字言論媒體控制：臺灣白色恐怖重大政治案件〉	收入張炎憲、陳美蓉編，《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論文集》，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9，頁 297-322。
36	夏良業	〈魏道明與臺灣省政改革（1947-1948）〉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37	馬有成	〈戰後初期國府接管臺灣之籌畫〉	《臺灣風物》，59：4（2009.12），頁 9-62。
38	高小蓬	〈臺灣省參議會推動地方自治之研究（1946-195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
39	倪仲俊、李汾陽	〈二二八事件前本土菁英的參與障礙與其我群意識的形成〉	收入楊振隆編，《二二八歷史教育與傳承學術論文集》，臺北：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9，頁 333-386。
40	陳正茂	《臺灣早期政黨史略一九〇〇—一九六〇》	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9。
41	陳立家	〈日治時期臺中地區地方菁英的重塑（1895-1935）〉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42	陳世宏	〈戒嚴時期對民主運動的壓制〉	收入張炎憲、陳美蓉編，《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論文集》，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9，頁 267-296。
43	陳武男	〈嘉義「三二事件」之研究：嘉義民眾在「二二八事件」中的抗爭與肆應〉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
44	陳佳宏	〈殖民、再殖民到解殖民？：林獻堂晚年的政治意向〉	收入李玉瑾編，《臺灣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殖民與近代化論文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09，頁 355-390。

45	陳佳宏	〈日治中期至二二八事件前後臺灣之認同糾葛：以精英為主的分析〉	《師大臺灣史學報》，2 (2009.3)，頁 115-160。
46	陳柏棕	〈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之殤：特設巡洋艦護國丸遭難始末〉	《臺灣史料研究》，33 (2009.6)，頁 34-60。
47	陳美蓉	〈國府統治時期對海外留學生的監控：以日本為例〉	收入張炎憲、陳美蓉編，《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論文集》，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9，頁 363-382。
48	陳焯翰	〈從《自由時代》系列雜誌看 1986 年的黨外運動〉	《臺灣史學雜誌》，6(2009.6)，頁 151-172。
49	陳翠蓮	〈臺灣戒嚴時期的特務統治與白色恐怖氛圍〉	收入張炎憲、陳美蓉編，《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論文集》，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9，頁 43-70。
50	陳翠蓮	〈情治機關內部鬥爭所引起的白色恐怖案件〉	收入張炎憲、陳美蓉編，《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論文集》，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9，頁 253-266。
51	陳儀深	〈秋後算帳：二二八事件中的「綏靜」與「清鄉」〉	收入楊振隆編，《大國霸權 or 小國人權：二二八事件 61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學術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9，頁 841-875。
52	陳儀深	〈戒嚴時期臺獨政治案件導論〉	收入張炎憲、陳美蓉編，《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論文集》，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9，頁 209-110。
53	張玉法等	《紮根臺灣六十年：百萬人的奮鬥、成長、融合》第一冊～第五冊	臺北：渤海堂，2009。
54	張炎憲、 陳美蓉	《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論文集》	臺北：吳三連史料基金會，2009。
55	張炎憲	〈鹿窟事件與歷史真相的追究〉	收入張炎憲、陳美蓉編，《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論文集》，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9，頁 189-208。
56	張耀仁	〈二二八事件期間駐臺中國記者報導之析論：以報導事件起因、省籍形象以及引述消息來源為例〉	收入楊振隆編，《二二八歷史教育與傳承學術論文集》，臺北：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9，頁 85-156。
57	許介鱗	《福澤諭吉：對朝鮮、臺灣的謀略》	臺北：問津堂，2009。
58	許文堂	〈澎湖山東煙台聯中師生冤案始末〉	收入張炎憲、陳美蓉編，《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論文集》，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9，頁 71-96。

59	許順昇	〈流亡世代的政治構思：《民主評論》的國家論述（1949-1966）〉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
60	許進發	〈左翼知識青年的肅清：學生工作委員會案〉	收入張炎憲、陳美蓉編，《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論文集》，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9，頁 97-136。
61	許建榮	〈國府統治時期對海外留學生的監控：以美國為例〉	《文史臺灣學報》，1（2009.11），頁 269-303。
62	國立國父紀念館編	《涇渭分明水長流：蔣渭水小傳》	臺北：國父紀念館，2009。
63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編	《臺灣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殖民與近代化論文集》	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09。
64	黃仁姿	〈外來政權與地方菁英：以 1950 年代農會改組為例〉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65	黃辰濤	〈爭取海外力量：中華民國外交、僑務、黨務在新馬的運作（1945-1957）〉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
66	黃信彰	〈反殖民運動初體驗：試論蔣渭水與青年學生運動之關係〉	收入蔣朝根編，《第一屆蔣渭水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蔣渭水化基金會，2009，頁 48-68。
67	黃惠貞	〈國民黨政權流氓取締制度起源研究（1927-1955）〉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68	黃翔瑜	〈山東流亡師生冤獄案的發生及處理經過（1949-1955）〉	《臺灣文獻》，60：2（2009.6），頁 269-307。
69	馮琳	〈論國民黨改造時期的社會調查（1950-1952）〉	《兩岸發展史研究》，（2009.12），頁 117-157。
70	彭佩琪	〈國民黨政府在美僑社的僑務工作（1949-196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71	曾健民	《1949 國共內戰與臺灣：臺灣戰後體制的起源》	臺北：聯經，2009。
72	楊渡	《簡吉：臺灣農民運動史詩》	臺北：南方家園，2009。
73	楊諄涵	〈謝東閔研究：省議會時期問政與主持省政為中心〉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所碩士論文，2009。
74	楊振隆編	《大國霸權 or 小國人權：二二八事件 61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學術論文集》	臺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9。
75	葛祥林	〈由東京審判看二二八〉，收入楊振隆編，《大國霸權 or 小國人權：二二八事件 61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學術論文集》	臺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9，頁 441-550。
76	廖慶洲	〈臺灣現代化先驅系譜〉	《臺灣風物》，59：1（2009.3），頁 133-160。
77	鄭志敏	〈從「市參議員」到「悽慘議員」：論二二八事件前後的第一屆高雄市參議員〉	收入楊振隆編，《二二八歷史教育與傳承學術論文集》，臺北：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9，頁 393-454。
78	蔣朝根編	《第一屆蔣渭水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臺北：財團法人蔣渭水化基金會，2009。

79	蔣朝根	〈蔣渭水與臺灣文化協會創立經緯〉	收入蔣朝根編，《第一屆蔣渭水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蔣渭水化基金會，2009，頁 7-26。
80	劉智濬	〈《臨床講義》的現代性渴望〉	收入蔣朝根編，《第一屆蔣渭水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蔣渭水化基金會，2009，頁 103-118。
81	劉碧蓉	〈日本殖民體制下星製藥會社的政商關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82	劉維開	《蔣中正的一九四九》	臺北：時英，2009。
83	劉熙明	〈再論蔣介石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責任：由蔣介石在國共內戰的作為來分析〉	收入楊振隆編，《二二八歷史教育與傳承學術論文集》，臺北：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9，頁 461-484。
84	蔡西濱	〈中共地下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1946-1950）：以臺北市地區為研究中心〉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2009。
85	蔡秀芬	〈以農工為基礎的民族運動談蔣渭水：談蔣渭水在臺灣初期農民運動的貢獻和改革理念〉	收入蔣朝根編，《第一屆蔣渭水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蔣渭水化基金會，2009，頁 69-84。
86	鄧慧恩	〈蔣渭水 1920 年代的翻譯活動初探〉	收入蔣朝根編，《第一屆蔣渭水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蔣渭水化基金會，2009，頁 119-130。
87	檜山幸夫	〈帝国日本統治下台湾における台湾人戦死者の：靖国神社合祀問題について〉	收入李玉瑾編，《臺灣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殖民與近代化論文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09，頁 15-40。
88	蕭欣慈	〈無心之文卻有意：十代軌跡下的書寫片段——探析蔣渭水的文學紋理〉	收入蔣朝根編，《第一屆蔣渭水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蔣渭水化基金會，2009，頁 153-166。
89	蕭碧珍	〈從志願到徵兵：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臺灣的動員〉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90	賴盟騏	〈彰化縣政治菁英之研究：1945-2007〉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
91	謝聰敏	〈在白色恐怖中算帳：劉明〉，收入楊振隆編，《大國霸權 or 小國人權：二二八事件 61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學術論文集》	臺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9，頁 891-932。
92	戴宛真	〈李萬居研究：以辦報與問政為中心〉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所碩士論文，2009。
93	戴逸純	〈蔣渭水化論述的跨界轉譯與想像：以顏智/甘地為中心〉	收入蔣朝根編，《第一屆蔣渭水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蔣渭水化基金會，2009，頁 131-152。

94	龍應台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臺北：天下，2009。
95	薛化元	〈威權體制的建立〉	收入張炎憲、陳美蓉編，《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論文集》，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9，頁 15-42。
96	蘇聖雄	〈「奸黨煽惑」：蔣中正對二二八事件的態度及處置〉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97	蘇瑤崇	〈論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軍事佔領體制」與其問題〉	《臺灣文獻》，60：2（2009.6），頁 1-43。
98	蘇瑤崇	〈外國人見證的二二八事件〉	收入楊振隆編，《大國霸權 or 小國人權：二二八事件 61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學術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9，頁 306-369。
99	顧敏耀	〈臺灣古典詩與二二八事件：以林獻堂、曾今可其步韻詩為主要究對象〉	收入楊振隆編，《二二八歷史教育與傳承學術論文集》，臺北：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9，頁 169-228。